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道路的探索*

——以《新青年》发表的主要文章为依据

陈翠芳 李小波

【内容提要】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执着坚守和庄严承诺，而这条道路的开创则源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 20 世纪初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际，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努力寻求中华民族的出路。他们探讨中国革命和社会改造的理论依据，确立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探讨中国社会发展道路，明确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分析变革中国社会的方式，肯定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创建共产党组织；探讨并确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等。从《新青年》发表的主要文章中可以大致领略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的初心、足迹和成就。他们对中国道路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当代启迪。

【关键词】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 中国道路 《新青年》

作者简介： 陈翠芳（1962-），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 430062）；李小波（1980-），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 430062）。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是中国共产党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其在新时代坚持中国道路的庄严承诺。今天，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如何坚守自己的道路，变得十分紧迫。回眸百年前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道路的探索，能给当下的中国诸多启迪，有助于我们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具智慧地应对各种现实难题。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新青年》积极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苏俄经验，先后成为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机关刊物（自 1920 年 9 月《新青年》第 8 卷第 1 号起）和中共中央理论机关公开刊物（1923 年 6 月至 1926 年 7 月终刊），是当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有鉴于此，我们谨以《新青年》发表的主要文章为依据，触摸这段寻找民族光明的惊心动魄的历史，追寻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中国道路的光辉足迹。

一、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中国道路的基本问题

20 世纪初，中国的先进分子在危机重重的困境中，希望探寻一条正确道路，因为这是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在这样复杂环境中努力探寻，力图科学解答其中的基本问题。

1. 发现中国社会改造和发展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在对一个社会进行改造、确定其发展方向时，理论的指导更加重要，犹如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料收集、整理与研究”（17JZD010）的阶段性成果。

茫茫大海中引导航行的灯塔。

20世纪初,各种各样的学说通过不同方式从英、法、俄和日本等国不断涌入中国,在古老而贫弱的神州大地激起层层波澜,形成了多种“新思潮”,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克鲁泡特金互助论、自由主义和初步引入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学说。这些思想与思潮有着各自的理论特点和政治主张,在社会变革大背景下,相互交织又相互论争,为当时的中国社会提供了多种选择,同时也造成了人们思想上的困惑、迷茫。究竟哪种理论才是最科学的,才能真正给中华民族带来光明?

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为了打破帝国主义对苏俄的封锁,也为了有效领导全世界工人阶级革命,共产国际将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作为其重要任务,并对各国共产党提出相关要求和指导。共产国际“三大”指出,宣传革命内容是共产党人最重要的任务,宣传的主要方式包括“对个人的口头说服,参加工人的职业运动和政治运动,通过党的报刊和书籍扩大影响”^①。中国是苏俄和共产国际东方战略的重心,也是在东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心。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批判各种错误思潮,公开表明其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理论信仰,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最早在中国介绍和传播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1918年11月,他发表《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新青年》第5卷第5号。以下无特别注明的皆指此刊),热情洋溢地介绍和歌颂十月革命,并满怀信心地展望:“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②1919年5月和11月,他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全文连载于《新青年》第6卷第5、6号,首次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并针对有些人认为马克思学说只讲阶级斗争而不重视伦理等误解,解释道,马克思“并不排斥这个人高尚的愿望,他不过认定单是全体分子最普遍的伦理特质的平均所反映的道德态度,不能加影响于那经济上利害相同自觉的团体行动”。李大钊认为,马克思关于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称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思想对社会主义宣传而言,“有如耶教福音经典的效力”^③。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介绍和热情称颂影响了一大批进步青年,在中华大地开启了一场马克思主义启蒙运动。

陈独秀于1919年12月在《新青年》发表《本志宣言》,批判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及其所制造的罪恶;主张要靠劳动者彻底改造社会,追求全社会幸福的“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1920年9月,根据新形势,他改变了当初与胡适关于《新青年》二十年不谈政治的约定,发表《谈政治》(第8卷第1号)一文,并运用唯物史观分析认为,政治、国家只是工具,但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是必需的工具,而现存的资产阶级国家、政治等不可能“扫除社会罪恶”;只有“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才是现代社会的“第一需要”^④。这表明了他的无产阶级立场和马克思主义信仰,标志其世界观转变的基本完成。

李达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杰出代表,面对名目繁多的社会主义学说,他极力澄清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其《马克思还原》(第8卷第5号)分析道,有些“马克思的门徒”误解了马克思,“固守师说的人则拘泥不化,自作聪明的人就妄加修改,把一个马克思的真面目弄湮没了”。对此,他大声疾呼:“马克思还原!”李达首次明确将生产力决定财产关系、无产阶级革命、消灭资本主义、解放全人类等概括为马克思的核心思想,强调:“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性质,是

① [匈]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1册,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北京:三联书店,1965年,第294页。

② 《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63页。

③ 《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4、32页。

④ 吴志娟、于丽主编:《〈新青年〉史料长编》(下),武汉:长江出版社,2013年,第510页。

革命的，是非妥协的，是国际的，是主张劳动专政的。”^①在《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第9卷第2号）中，他进一步批判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人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歪曲马克思主义，明确肯定马克思派社会主义，认为它是代表劳动大众的“多数主义”。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接受共产国际指导，为中国社会的改造和发展确立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此时，他们所理解和宣传的马克思主义侧重于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列宁的社会革命理论和建党理论等，以满足当时中国革命的需要。

2. 探寻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道路

20世纪初，中国刚刚结束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封建思想仍盘踞于绝大多数人的头脑中，现代民主政治仅停留于少数先进知识分子的呼唤。在此境况下，中国到底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人们分歧很大，争论激烈。张东荪等人认为，中国缺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物质基础，也没有“劳动阶级”即无产阶级革命主体，只能先发展资本主义，待富裕后再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种观点在当时有较大影响。

共产国际从1920年5月正式派代表对中国革命进行指导，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维金斯基、马林等，并通过革命局等机构有组织地介绍和宣传苏俄革命和建设成就。受此影响，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批判了张东荪等人的错误观点，主张以俄为师，走苏俄道路即社会主义道路。

1921年8月，蔡和森在致陈独秀的信中谈到“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第9卷第4号），批判张东荪等人先发展资本主义的论调，认为，资本主义无孔不入，早已渗透到落后国，“经济上的压迫，东方农业国野蛮国的无产阶级之所受较西方工业国文明国无产阶级之所受为尤重”；无产阶级的解放“绝不是一个地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问题，乃是一个世界的社会问题，马克思社会主义乃是国际的社会主义”。他批判张东荪等人忘记了中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处境，忘记了外国资本家早已成为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主人^②；明确强调，如果无产阶级不先发制人，必将受制于人，中国只有走俄国式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出路。

陈独秀于1920年12月发表《独秀复东荪先生底信》（第8卷第4号），针对张东荪的论调指出：“如果说开发实业非资本主义不可，集中资本非资本家不可，我们便未免发笑。”他区分资本与资本家二者的界限，认为，我们需要资本，但不需要“更不应该制造资本家”。1921年7月，陈独秀在《社会主义批评》（第9卷第3号）中认为，资本主义弊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暴露无遗，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面临“必然崩溃的命运”，虽然拯救贫弱的中国不得不发展实业，但如果仍要“采用在欧美已经造成实业界危机的资本主义来发展中国实业，未免太无谋了”^③。

1921年5月，李达在《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第9卷第1号）中指出，中国虽没有西方式发达的资本主义，但也有劳动阶级，“中国境内的资本家是国际的，全国四万万人都可算是劳动者”。针对梁启超以资本主义的“温情”政策缓和社会矛盾的主张，李达揭露道，这完全是自欺欺人，只会加重和延长劳动者的痛苦。他认为，资本主义横行霸道，欺压劳动者，这种本性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围都无实质差别，因此，“我们不能说外国资本家所行的资本主义应该反对，本国资本家所行的资本主义就不应该反对”，相反，我们“要谋国际的团结，要扫灭全世界所有的资本主义”^④，劳动者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

① 吴志娟、于丽主编：《〈新青年〉史料长编》（下），武汉：长江出版社，2013年，第553、557页。

② 参见吴志娟、于丽主编：《〈新青年〉史料长编》（下），武汉：长江出版社，2013年，第648、650页。

③ 吴志娟、于丽主编：《〈新青年〉史料长编》（下），武汉：长江出版社，2013年，第540、613、614页。

④ 吴志娟、于丽主编：《〈新青年〉史料长编》（下），武汉：长江出版社，2013年，第579、581、582页。

可见，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有力批驳了错误观点，揭露了资本主义的本性，分析了中国劳动者特别是产业劳动者受到国内外资本家的双重压迫，进而强调了走苏俄革命道路是落后的中国发展和富强的最便捷途径。

3. 找到变革中国社会的方式：社会革命和建立中国共产党

20世纪初，对于中国需要变革的问题，人们有相同的态度和紧迫感，但以什么方式变革、变革到什么程度，却看法不一，其中，改良派和无政府主义影响较大。对于这两种错误思潮，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克思恩格斯理论和共产国际决议为依据给予了有力驳斥，强调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建立无产阶级政党。

(1) 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张东荪、梁启超等改良派明确反对暴力革命和走苏俄道路，认为中国不具备苏俄革命的条件。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批判改良派，阐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核心是无产阶级专政，主张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不过，在中国共产党“二大”前，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阶段等认识尚浅，主要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做一般性阐述。从1922年11月5日到12月5日，共产国际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陈独秀等中共代表出席。大会制定了各国共产党建立国内和国际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提出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要进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和反封建的土地革命^①。在此次会议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召开“二大”，修正了“一大”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等主张，明确了当时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正确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经历并领导了这一转变。

陈独秀在《谈政治》中明确提出，无产阶级是民主的主体，而实现无产阶级新型民主的方式是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批评》中，他以《共产党宣言》等为依据，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明明是马格斯底主张”，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基本主张概括为阶级战争、直接行动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并解释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不许有产阶级得到政权的意思，这种制度乃是由完成阶级战争消灭有产阶级做到废除一切阶级所必经的道路。”^② 1921年8月，施存统在《马克思底共产主义》（第9卷第4号）中详细介绍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主张以阶级斗争彻底改变中国的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他引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观点，认为，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必须经过一个革命的转化时期，相应地，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期，即出现无产阶级革命的“独裁政治”，但这个独裁“不是个人的独裁，而是阶级的专政”，它以无产阶级民主为基础^③。李达在《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中认为，中国革命不可能走梁启超等人所设想的改良主义道路，而应根据中国实情，采取俄国式“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夺取国家政权。在《马克思派社会主义》中，李达具体分析了劳农专政的作用、目的和形式。蔡和森认为，中国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十分恶劣，“革命之爆发乃是必然的趋势，也如自然力的雷电之爆发一样，行所必然”；即使革命失败了，“为革命而战死而饿死，死得荣誉”。他还设计了中国革命的具体步骤和措施，同时声明：“我是极端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并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最终目的“在取消阶级”^④。

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虽然对人类彻底解放具有过渡性、工具性，但对于改造中国社会和拯救中华民族是至关重要的。对此，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有清醒的认识，并能够将其认识转化为革命

① 参见〔匈〕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1册，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北京：三联书店，1965年，第417-419、444-449页。

② 吴志娟、于丽主编：《〈新青年〉史料长编》（下），武汉：长江出版社，2013年，第616、617页。

③ 参见田子渝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北京：学习出版社，2012年，第218页。

④ 吴志娟、于丽主编：《〈新青年〉史料长编》（下），武汉：长江出版社，2013年，第648、650页。

行动。

(2) 筹建共产党组织。苏俄和共产国际十分重视共产党的组织建设。1921年6月至7月,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强调,“共产国际从成立之时起就明确规定自己的任务”就是“直接参加工人群众的斗争,对这一斗争实行共产主义的领导,并且在斗争过程中建立强大的、革命的、群众性的共产党”^①。同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柯尔斯基参与筹备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背景下,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唯物史观为依据,强调要实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需要有严密的组织,并积极筹建共产党组织。

1921年8月的《陈独秀答区声白的信》(第9卷第4号)深刻批判无政府主义的绝对自由论,认为,现实中“决没有绝对的自由,决不能实现无政府主义”,“我们唯一的使命只有改革社会制度”。他充分肯定列宁领导的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指出:“只有俄国底共产党在名义上,在实质上,都真是马格斯主义。”^②陈独秀不仅强调党组织的重要性,并在实践中积极筹备建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22年7月,李达在其《评第四国际》(第9卷第6号)中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应先由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组织一个共产党做指导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柱石,是无产阶级的头脑”,是革命的“参谋部”^③。李达也将思想变为行动,为创建中国共产党做出了杰出贡献。

正是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努力下,中国共产党得以诞生,成为中国革命的坚强领导核心。

4. 明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关系:要紧密结合

列宁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具体实际的结合,特别是与落后民族的国情相结合,列宁主义正是这种结合的产物。在列宁主义指导下,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努力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由》(第7卷第2号)中,李大钊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原理分析孔子思想盛衰的原因,认为,孔子思想“能在中国行了二千余年,全是因为中国的农业经济没有很大的变动,他的学说适宜于那样经济状况的原故。现在经济上生了变动,他的学说,就根本动摇,因为他不能适应中国现代的生活、现代的社会”^④。这里延续和深化了他在《再论问题与主义》(1919年8月17日发表于《每周评论》第35号)中的思想,即马克思主义必须围绕中国的“实境”、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李达在《马克思派社会主义》中指出,中国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革命,但是,“中国何时能够发生社会革命?中国社会革命究竟采用何种范畴的社会主义,大概也是要按照国情和国民性决定的”^⑤。

马克思主义能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关系到其能否真正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也关系到中国革命的成败。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损失,其原因较多,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特定情况下将列宁主义教条化、机械执行共产国际决议及其代表的意见,是重要原因之一。

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中国道路的主要方式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中国道路的过程,是与形形色色错误思潮进行斗争的过程,是他们批判

① [匈] 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1册,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北京:三联书店,1965年,第261页。

② 吴志娟、于丽主编:《〈新青年〉史料长编》(下),武汉:长江出版社,2013年,第622、617-618页。

③ 杨宏峰主编:《〈新青年〉简体典藏全本》第9卷,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36、535页。

④ 《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9页。

⑤ 吴志娟、于丽主编:《〈新青年〉史料长编》(下),武汉:长江出版社,2013年,第607页。

自我和超越自我的过程，也是他们密切结合国内外革命实践的过程。

1. 与错误思潮做斗争

(1) 尖锐批判各种错误思潮。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道路的探索与对各种错误思潮的批判和斗争相伴随，集中体现在几场大论争中，即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关于社会主义的论争、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争。第一场论争与《新青年》间接相关，后两场论争是《新青年》组织和引导的。

“问题与主义”论争的主阵地虽是《每周评论》，但它营造了整个社会的思想氛围，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思想；同时，论战一方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主要代表李大钊；而作为这场论战的结束语则发表在《新青年》上，即胡适的《新思潮的意义》发表于《新青年》第7卷第1号，李大钊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发表在《新青年》第7卷第2号上。李大钊批判胡适的错误观点，明确主张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为指导来改造中国，提出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这场论争也促使陈独秀、毛泽东等先进知识分子转向马克思主义。

关于社会主义的论争实际上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战，前者以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为主体，后者以张东荪等人为代表。在论争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揭露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实质是发展资本主义，并指出，改良主义无法拯救中国，因为中国早已被世界资本主义所渗透，中国劳动者受到世界资本家的沉重压迫，已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中国的出路和希望，而最便捷的途径就是走苏俄道路。

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争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斗争。针对无政府主义者抽象地反对一切强权、一切组织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调，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尖锐地指出，国家是强权的工具，在社会经济发展特定阶段是必不可少的，但国家有不同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国家维护广大劳动者的利益，无产阶级专政是推翻剥削阶级统治和使广大劳动者获取政治经济权益的重要保障。

通过几次思想大论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深入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也在更大范围传播了马克思主义。

(2) 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许多人都曾受过错误思潮的影响，但后来进行了自我批判，完成自我超越，转向了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最早满怀激情地肯定和赞颂马克思主义，但其思想转变到马克思主义也有一个过程。他曾是新文化运动主将，相信过激进的民主主义。十月革命后，他发表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其世界观基本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但此时，他还没有完全摆脱无政府主义、互助论等影响，还试图调和阶级斗争论与互助论。此后，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认识，他才真正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一个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的艰难过程。陈独秀曾是激进民主主义者，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其思想转向马克思主义。这一转变影响重大，直接促使《新青年》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①，引领整个中国思想战线的马克思主义方向。蔡和森最初受新村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曾尝试在长沙岳麓山等地建立新村。不久，他“猛看猛译”外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而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投身于中国革命，并付出了年轻的生命。李达曾期望实业救国，毛泽东、恽代英等曾受新村主义影响^②，但他们最终超越自我而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和实践者。

中国共产党“一大”制定了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提出直接“消灭资本家私有制”，将各种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在革命斗争中“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

① 参见田子渝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北京：学习出版社，2012年，第36、38页。

② 参见吴雁南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1840-1949）》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281-282页。

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①，这些认识和决议极大地超前于当时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现实。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提高了理论水平，在“二大”上制定了正确的战略。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及其所创建的中国共产党，都经历了思想上的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其过程虽艰难甚至痛苦，但正因为有这种艰苦磨炼，他们才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2. 与革命实践紧密结合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在思想上、理论上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同时在革命实践中积极探索中国道路。当时的革命实践主要包括国内的革命实践和苏俄革命与建设的实践。

(1) 结合中国革命实践。当时中国革命实践的首要任务是筹备成立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指导和帮助下，在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人的积极探索下，各地先后成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留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在法国和日本也建立党的早期组织。这些早期组织名称不一，但实质相同。它们有组织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创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刊物和工人学校，领导成立工会和工人运动，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活动就不再是个人行为，而是有明确纲领和严明纪律的组织行动。

为了“打倒列强，铲除军阀”，从1924年1月到1927年7月，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共产党积极与国民党合作。这次国共合作广泛动员了工人农民，开创了民主革命的新局面，也推动了北伐战争。国共合作虽然因国民党的背叛而失败，但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领导下，根据中国国情做出的大胆尝试，是以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创造性探索，其经验和教训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宝贵财富。

中国共产党积极组织 and 领导工人运动。1922年1月，香港海员大罢工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各项工作，不失时机地号召全国工人支援，使罢工取得胜利。1923年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1925年5月“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号召并领导上海人民罢工、罢课、罢市。后两次运动虽因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但在领导和组织革命运动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更深入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也磨炼和提高了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能力。

(2) 结合苏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而最终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了解苏俄革命和建设成就，歌颂它，学习它，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任务。

首先，介绍和称颂苏俄革命和建设的成就。苏俄和共产国际或派来华使者，或通过俄华通讯社（中国称为“中俄通信社”）等机构，或借助其资助的《新青年》《向导》等中国报刊，向中国介绍和宣传苏俄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及欧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并组织翻译列宁著作，及时向中国传播苏俄最新理论成果。在此氛围下，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积极翻译和介绍列宁思想，宣传苏俄政治、法律、农业、工会、教育等多方面建设成就。同时，瞿秋白作为中国共产党委派记者到苏俄采访和观察，报道了大量苏俄建设情况。这些介绍和称赞，使中国人民较具体地了解了俄国革命和建设的实况特别是成就，更加向往社会主义，也激励了中国人民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新政权的斗志和信心。

其次，了解并反思苏俄社会主义建设的困难。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因基础弱、多年战争和帝国主义经济封锁等，经济形势极为严峻。1921年春，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主张实行粮食税、允许商品交换和部分私营经济、利用资本主义等，以解决当时经济困境，为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列宁强调：“各种过渡经济形式都可以利用”，“应该善于利用它们来……活跃我们这个满目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8页。

疮痍、受尽苦难的国家的国民经济，振兴工业，为今后采取各种更广泛更深入的措施如电气化等创造条件”^①。苏俄经济建设遇到的困难，促使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思考如何借鉴苏俄经验，也思考中国革命和未来建设如何才能更加顺利。这些思考深化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复杂性、艰巨性的认识，纠正了革命队伍中的急功近利倾向。

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道路探索的重要价值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民族危亡之际探索民族的出路，这种探索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

1. 历史价值

回首过往，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道路探索的历史价值十分突出。

在思想上，澄清模糊认识，批判错误观点，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从此，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克服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一个又一个困难，虽然其间也曾出现过失误和曲折，但都加以自我纠正，最终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成为共产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信仰。

在实践上，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创立中国共产党，明确了革命的目的、原则、方式和途径，确定了革命的总指挥。同时，他们积极向广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宣传马克思主义，鼓励、组织和指导革命运动，使中国革命的群众基础日益扩大和坚实。在实践活动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唤醒和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培育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意识和革命斗志，使中国共产党在斗争中得到锻炼。这种实践探索为后来中国革命和建设确立了基本原则，奠定了良好基础。毛泽东的实践观、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思想和工作方法、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等，都不同程度地根植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探索。

2. 当代启示

百年后的今天，国际环境、中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道路的探索精神和探索成果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当代启示。

(1) 舍我其谁的历史担当。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以舍我其谁的历史担当，自觉担负起历史重任，以救国救民为己任，付出了他们的青春、热血甚至生命，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也面临新的困难和新的任务，这需要共产党员和干部以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为榜样，满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关心国家发展，积极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2) 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界十分活跃，也异常复杂，一些错误思潮影响较大。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错误思潮进行了尖锐批判，包括纠正自己的错误认识，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信仰，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干扰，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没有动摇，不少人为了信仰而奋斗终生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在价值多元化的当代，思想观念的矛盾和冲突不断加剧，意识形态的斗争隐蔽而激烈，这直接冲击着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价值观和信仰，也影响到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作用。我们应保持政治上的敏锐性和理论上的洞察力，善于辨别是非，勇于批判错误思潮，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立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推动我国各

^①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4页。

项事业健康发展。

(3) 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明确的目标、纲领和战略。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加强与共产国际的联系,组织和领导各种革命运动,党也在革命实践中发展壮大。在新时代,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实现。因此,我们党需要进一步完善自身,提高应对各种严峻挑战的能力;同时,全国人民应自觉维护党的权威和核心地位,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更大成就。

(4)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从成功和失败正反两方面经验中探索出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才能有效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指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这一点已成为基本原则,毛泽东明确地将其概括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加以系统阐述。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又面临各种新矛盾、新挑战。解决这些新问题,直接可资借鉴的经验很少。因此,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奠定的基本原则,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立场的前提下,求真务实,根据新的时代特征和我国发展实践,创造性地解决新的矛盾和困难。

(5) 国际视野和整体性思维。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共产国际的指导和独立思考,将中国与其他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认识,从国际视野考察和分析中国所处的地位、工人的生活状况和革命问题,认识到资本主义是国际的,资本家没有国界,“劳动者没有祖国”,“社会主义没有国界”^①,坚定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同时,他们从苏俄革命和建设中获得信心,并以苏俄和共产国际为中介,从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吸取经验和力量。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这种国际视野和整体性思维解决了中国革命的理论难题和实践难题,阐明了中国革命道路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随着经济全球化广泛而深入的发展,每个国家和地区的问题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世界性问题。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相比,今天采取国际视野、整体性思维的现实条件更加成熟,这就要求我们学习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视野、胸怀和整体性思维方式,从世界整体、从全球视角分析和解决中国问题,也从中国的视角来把握时代特点和全球问题。

参考文献:

- [1] 王增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 [2] 徐信华:《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 [3] 吕延勤主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料长编:1917—1927》,武汉:长江出版社,2016年。
- [4] 陈桂香:《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年。
- [5] 杨荣、田子渝:《马列主义著作文本在中国的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6期。

(编辑:张 桥)

^① 吴志娟、于丽主编:《〈新青年〉史料长编》(下),武汉:长江出版社,2013年,第581页。